

后世俗视域中的文学、艺术和宗教

——第十三届“神学与人文学”暑期国际研讨班综述

Literature, Arts and Religions in a Post-Secular
Horizon: Review of the 13th Summer Institute
on Theology and Humanities

赵

ZHAO Jing

作者简介

赵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ZHAO Jing,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zhaojingisme@gmail.com

Abstract

From 18-20, 2017, the 13th Summer Institute on “Theology and Humanities” was held in Kaifeng, Henan Province, under the theme “Literature, Arts and Religions in a Post-Secular Horizon.” The Summer Institute was hel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12th Trienni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as a round-table foru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Religious Studies” within the CCLA Congress. More than 30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in Israel, the US, Hong Kong,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were invited to present papers, discussing and exchanging views on Theology and the Humanities.

Within a thematic framework of the “Post-Secular Horizon,” participating scholars presented papers in a wide range of disciplines, from religious philosophy, biblical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Sinological studies.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major concerns and issues raised during the Institute, including post-secularity, ethics, critical theory, religious cinema, theological aesthetics, natural writings, literary figure studies, studies on (meta-)language, missionary Sinology, translation studies, comparative classical studies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ies. The Summer Institute demonstrated the best of academic efforts to reflect on the post-secular human and to engage with various questions in literature, arts and religion.

Keywords: theology, humanities, post-secula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2017年8月18日至2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办，河南大学协办的第十三届“神学与人文学”暑期国际研讨班在河南开封隆重举行。本届暑期国际研讨班同时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二届年会的一个圆桌论坛——“比较文学与宗教研究”，来自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台湾辅仁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30多位国内外学者发表主题演讲，并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学术对话。

本次论坛主题为“后世俗视域下的文学、艺术与宗教”。近世以降，人文主义自神学环境中的颖脱而出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历史变革；时至今日，圣神远逸，政教析离，传统式微，个体争辉于普遍，理性凌越乎信仰，一个世俗时代已清晰可辨。韦伯针对世俗化的经典论断言犹在耳，哈贝马斯、泰勒等思想家则以“后世俗”的名义揭橥了全新的时代性思考：如何在对现代性之诸多成果予以继承和守护的同时，在公共领域内重新激活传统的灵性资源，实现人文学和神学之间更为深广的交往与对话，从而修补世俗化生命在超越维度上的根本缺损？针对世俗化的全面“除魅”，在文学与艺术中或可见证一种后世俗的“返魅”——自然中神圣再显，形象中生命与意义重逢；同时，哲学与宗教从近似的处境出发，直面神性或人性的他者，寻求世间而内在的超逾，或亦达致相同的思想境地。而在时下人文学学术话语的系谱中，各路“后学”昌明盛炽，自不待言。有所取于后学之灵活通脱（而非其漫漶无涯），对传统中艰深严肃之处假以充分化用，即立身于后世俗性，着眼于世俗之“后”，而从文学、艺术与宗教的研究中获取思想与启迪，这也是本次研讨班的主题命意所在。

经过历时三天、总计六场的专题论坛研讨，与会30多名学者围

绕会议主题，在广阔的学术视野下进行了跨学科、跨语言、跨信仰的积极研讨，所涉领域包括：宗教哲学、圣经研究、文化研究、比较文学、汉学研究等，具体涉及的话题有：后世俗性、伦理学、批判理论、宗教电影研究、自然文学研究、作家及作品研究、形象研究、神学解释学、神学美学、语言问题及元语言理论、语言与文化身份研究、传教士汉学、经典翻译、比较经学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等。紧凑而充实的学术对话，用切近的思考回应了时代问题，以文学与艺术濡润了深奥的理论，让深藏于历史尘霾中的生命重现光采，也从经典中古老的疑惑中焕发出新知。

一、宗教研究、后世俗性与比较文学

神圣、世俗与后世俗之辩，不仅是历来宗教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同样是哲学、文化研究以及社会历史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反思视角。台湾辅仁大学曾庆豹教授紧扣会议主题，其论文《论世俗时代与宗教现代性——泰勒（Charles Taylor）的论点》扼要地阐述了泰勒在《世俗时代》中提出的观点：在内在性（immanence）框架的遮蔽下，现代性意味着上帝与宗教信仰被某种自负的人文主义（exclusive humanism）所替代，后者则会抹杀生命之外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 beyond life）。宗教从身体与文化的日常生活中的离去，可以用“离肉身化”（excarnation，即基督教“incarnation”概念的反面语）一词来形容，新教的改革即带有这一特色，并将其扩展到近代西方的自我概念。为对治现代性的诸多弊端，泰勒提出了“大公现代性”（Catholic modernity）的概念，意欲回归καθ' ὅλου（Catholic的字根）概念的双重意涵——即兼顾“普泛性”与“整全性”，不再执着于“基督王国”（Christendom）这一历史概念，而在承认多元性的前提下向超越性保持开放。曾庆豹借此提出了“深化在地化”的看法，探讨了如何推进利玛窦的历史经验，让宗教生活通过世俗社会而向超越性保持

开放的可能性。

香港中文大学赖品超教授的论文题目为《从后世俗的视域诠释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文章指出，宗教传统上对《路加福音》中好撒玛利亚人故事（The Good Samaritan）的阐释，大多具有浓郁的一神论色彩，如马丁·路德指向基督中心论的寓意解读。然而基于故事文本的分析，可发现经文本身对于“慈悲”和“怜悯”有特殊的重视。有不少生物学家往往将表面“利他”的行为归结为有助于存续物种、传播基因的“利己”行为，这种观点忽视行动者的动机和感受，有时过于极端地以世俗化的世界观解释生命，自有其局限性。赖品超继而转向了社会生物学家巴特森（C. Daniel Batson）对于利他主义的研究，后者试图证明人类（乃至许多灵长类动物）在生物本性中即存在某种利他的同情心。他认为，巴特森的研究可与孟子关于“恻隐之心”的论述交相呼应，二者皆在人性中寻得了某种向超越性开放的同情心，既不局限于某一宗教领域，又有别于世俗主义，因而构成了后世俗的立场与解释。

安徽大学郑鹏博士的发言题为《世俗批评、宗教批评与经典：从后世俗的视角再观萨义德的批评观》。萨义德（Edward W. Said）区分世俗批评和宗教批评，并着力肯定前者贴近现实，指摘后者的神秘色彩。基于马克思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传统，萨义德在美国1980年代的“经典之争”中鲜明地表达了反精英主义、反经典封闭、支持多元化的立场。郑鹏继而指出，近年来多元主义的胜利却滑向了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人文主义的真理反而隐匿不见，这是萨义德本人始料未及的。为矫治这种流弊，将萨义德的批判观重新理解为某种不自察的复杂异教思想，或许是一种有益的后世俗主义尝试。

中国人民大学陈涛博士的报告题为《后世俗视域下的中国当代电影：佛教的再现与挪用》。作者思考了佛教元素如何以一种“返魅”的方式进入大众视觉文化领域并形塑人们的观看、消费和审美，以及这一过程所表现出的中国电影的文化症候。陈涛指出，佛教因素在

电影中的返魅呈现为魔幻、商业噱头、异域奇观等形态，却缺乏对终极问题的追问，总体上仍处于边缘化状态之中。从后世俗视角出发，佛教电影如想对抗意义领域的慢性枯竭，在形塑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进程中贡献积极力量，须在艺术理想和思想深度方面再做努力。

作为人文学科中的重要一员，比较文学以其善于从事跨学科研究、涉猎广博而著称，本次研讨班有几位学者从比较文学研究出发，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神学或宗教议题。河南大学邱业祥教授在其论文《超越作为特殊性的宗教：莎士比亚与圣保罗的普遍主义——以〈威尼斯商人〉为例》中，先借助巴丢（Alain Badiou）、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等人的解说重构了保罗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又对莎剧《威尼斯商人》的情节作了分析：夏洛克和安东尼奥的冲突以及双方事实上的不宽容表明，在一个商贸发达，各民族、各宗教广泛交流的崭新时代里，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成为了有待超克的特殊性。莎士比亚力图构建的普遍主义乃是基于和源于普遍的自然人性，既伸张了世俗幸福和共情原则，同时主张将宗教限制在私人领域，在公共生活领域中遵循公共规则和法律。

中国人民大学赵惊博士的报告以《文学与宗教之间的“神女”形象》为题，阐述了以“神女”对译西文“nymph”的内在可能性与合理性，又对各类神女故事中的基本叙述因素（mytheme）作了提炼。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他揭示了古代神女形象背后的宗教背景，同时指出，唯有通过“文学性”的方法，神女形象中蕴含的阴魅可怖的一面方可以得到升华和转化。

广西民族大学李忠敏博士的论文题为《库切〈耻〉中的替罪羊及其功能》。论文分析了库切（J. M. Coetzee）对替罪羊文化原型的运用：被动受难的形象彰显了集体或个体暴力的存在；李忠敏认为，库切笔下的替罪羊形象同样具有救赎功能：人只有主动承担起个体的苦难和责任，学会忍耐和虚己，才有可能走出权力所主导的历史的戕害。

苏州科技大学徐文博士的论文《从“光”意象管窥罗伯特·勃莱的“深层意象主义”》以罗伯特·勃莱（Robert Bly）在《湖上夜钓》一诗中使用的“光”意象为例，分析了“深层意象”的生成过程：“光”和灯一起以物质的形式出场，后逐渐脱离物质性，变得抽象，随着心理能量的深化转移，最后变成一种连接意识与无意识、沟通内外世界的“深层意象”。徐文认为，“深层意象主义”不仅建构了一种健康的审美认知心理，其中也包含着对现代人性的批评，提倡了全新的文化价值。

信阳师范学院柳世军博士的论文《后世俗主义视域下朗费罗诗歌的“神圣”与“世俗”阐释》围绕着会议主题，并对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诗歌作出了解读。他认为，朗费罗的诗歌以建构“神圣”为主旨，以“世俗”为服务对象，克服了圣俗之间的二元对立，使二者互利互惠：诗歌融入大众读者的生活，宗教的伦理亦得传扬。

二、神学诠释学、神学美学、语言问题与传教士汉学

西方哲学历来与神学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现代哲学巨擘如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那里，神学思想的背景往往若隐若现。针对这一问题，香港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同济大学教授林子淳博士发表了题为《语言作为诠释学普遍性的基础——为何伽达默尔要使用神学？》的主题演讲。论文集中探讨了《真理与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第三部分的“语言转向”，尤其是“语言与话语”（*Sprache und Verbum*）一章，详细阐释了为何伽达默尔要在至关重要之处微妙地使用了神学资源。细读文本，可知伽氏将诠释学经验建基于基督论-人类学，即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的道成肉身和三一论思想。格朗丹（Jean Grondin）发明了其中的奥古斯丁资源，抓住了“内在话语”这一关键，却在诠释学经验之普遍性问题上犹有未竟

之处。亚托斯（John Arthos）和奥利花（Mirela Oliva）分别将问题联结到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及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Cusanus），以多元的神学资源丰富了这场学术讨论。在此过程中，内在话语问题得到了透彻领会，而最终诠释的普遍性则须落实到人类语言的事物联系之中，这正好回归了现象学的传统。林子淳认为，伽达默尔使用道成肉身、三位一体等神学旧题，并非执着于其教义内容，而是借用其思想结构，针对沉迷于内在话语的希腊逻各斯传统构成一种重要的补充，并以这种充实具体的语言概念作为诠释学的中介，向实践知识和生活世界保持开敞。

北京语言大学张华教授的论文《文学：教会与社会之间——美国自然文学的神圣视域》力图在美国自然文学中探索神圣空间与公共空间——即教会与社群——之间的的关系。借助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独白”（monotone）、“复调”（polyphony）、“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的分析框架，张华对惠特曼（Walt Whitman）、缪尔（John Muir）、迪金（Roger Deakin）这三位自然文学作家加以细致分析，并探讨了他们各自与读者交往的方式——引导读者、教育读者、建立可供读者相互交往的“生态张力场”（ecotone）。张华认为，“自然”与“他者”常常被读出“神圣”，而这恰恰是文学所赋予的。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着实具有连接教会与社会、宗教与世俗、神圣与公共、神学与人文学的纽带与桥梁功能。

自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的七卷巨著《主之荣耀：神学美学》出版以来，国际学界兴起了“神学美学”的研究热潮。在题为《神学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形象与意义的重逢》的报告中，中央民族大学宋旭红教授回顾了20世纪神学美学的发展历程，并指出：形而上学衰颓以来，艺术在“无意义”的指控下反而更加迫切的寻求“意义”，是为神学美学兴起的原因所在。同时，神学将各种艺术作品理解为“形象”（imago），并不断学习着形象化、艺术化的表达方式。而在标新立异、解构狂欢的后现代处境中，艺术却逐步走向了意义消

解的废墟状况。宋旭红认为，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艺术或形象如想重新寻回意义，就不得不注目于神学，而这无疑会对神学美学的再度繁荣带来希望与契机。

20世纪人文学术的“语言转向”已是不容置辩的事实。从后世俗的角度重思文艺与思想，语言是一大关键。在题为《喀巴拉神秘主义视角下的本雅明元语言论》的报告中，北京语言大学陈影博士介绍了犹太教喀巴拉传统（Kabbalah）如何以语言为途径解释并挽救传统。植根于这一传统，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认为世界起源与最终救赎的秘密全部隐藏在原初的纯语言中，现代性只能与“堕落”相提并论。其关于纯语言、名称及翻译的思想，可看成是一种对本源的记忆和一种在语言神学层面上开展的弥赛亚回归。

浙江外国语学院陈芸博士以《“更微妙的语言”——论查尔斯·泰勒对里尔克诗歌的诠释》为题，撰文探讨了浪漫主义诗歌语言问题。她指出，“更微妙的语言”（a subtler language）是理解泰勒诗论的关键语，而后者又以对里尔克诗歌的解读为基础。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等浪漫主义诗人们试图建立一种具有“建构性、启示性的语言”，在明确给出对象特征之前，采取修辞手段，利用微妙语言的模糊多义，以世俗形式言说宗教内容。而在后世俗时代中，失去了存在链条、神圣秩序的参照系，诗性语言变得极为脆弱。

北京语言大学柳博赞博士则将语言问题拓展到地缘政治、宗教及历史语境下。在题为《亚述与亚兰之争——叙利亚语族群的民族认同问题》的报告中，她追溯了叙利亚语基督徒（Syriac Christians）这一古老群体的演变历程，缕述了东方教会（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叙利亚正教会（Syriac Orthodox Church）以及迦勒底天主教会（Chaldean Catholic Church）各自独立发展的历史经过。19世纪英国圣公会将叙利亚语基督徒的民族身份认同为“亚述”（Assyrian），而经历了20世纪一系列社会历史事件之后，叙利亚正教会又重新采纳了“亚兰”（Aramean）的身份认同，并为此与东方教会产生了争执。柳博赞总结

道，在民族身份的形成和认定过程中，相较于语言、习俗或文化等因素，宗教（尤其是政治化的宗教）因素往往会起到核心作用。

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中，传教士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从后世俗视域重思传教士活动及其学术成果，也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重要板块。济南大学刘丽霞教授的《包贵思与燕京大学现代作家群》一文围绕20世纪前半叶燕京大学美籍教授包贵思女士（Grace M. Boynton）的职业生涯，介绍了包氏与燕大作家群——如基督徒冰心、共产党人杨刚、反教会者萧乾等人——超越信仰的交往，也借此说明了燕京大学作为教会大学独特的文化传播功能。

借助传教士汉学研究中国之于欧洲乃至全世界影响，也是一条重要的研究路径。上海师范大学纪建勋博士的文章《谁的“上帝之赌”？——帕斯卡尔与中国》即是这样一篇追溯之作。耶稣会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的《天主实义续篇》中论证上帝存在的“上帝之赌”与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在《思想录》中证明上帝存在的“打赌说”无论在逻辑上还是篇章结构上都非常相似；基于这一发现，纪建勋参鉴帕斯卡尔《外省人信札》、卫匡国《中国上古史》等著作，评估了驻华耶稣会士对帕氏施加直接影响的可能性，还将帕斯卡尔、莱布尼茨及耶稣会士看作一个相互影响的复杂三角，并对近代中国社会宗教的文化品格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三、翻译研究、比较经学、思想史与理论研究

翻译是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最基本媒介之一，也是神学和人文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本届研讨班一如既往，对翻译问题，特别是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经典的翻译工作倾注了大量学术兴趣。上海师范大学丁大刚博士认为，圣经翻译中的“译名之争”其实在19世纪末期已经实质解决：以“上帝”对译西文“God”，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可。其《理雅各解决“译名之争”的社会学阐释》一文援引拉

托 (Bruno Latour) 的社会学理论, 提出知识领域的争论往往凭借“权威”和“划界” (boundary work) 两种方法来解决。丁大刚指出, 1877年以后, 理雅各大力推崇儒家的宗教性, 将译名之争的角力场域由传教领域转向了比较宗教领域, 最终确立权威、实现划界, 事实上解决了“译名之争”, 客观上也促进了“儒教”概念的发明。

中央民族大学高志强博士报告了他对循道公会传教士翻译家苏慧廉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的研究。在《略论苏慧廉“全新”的《论语》译本》一文中, 他强调了汉学传承的概念, 指出苏慧廉翻译《论语》, 是为了更新理雅各已经不再受学生重视的旧译本; 他分析了苏译本的影响来源, 指出后者受到殷铎泽译本、马士曼译本和理雅各初版译本的影响; 高志强最后以“孝”的翻译为个案进行了译本比较, 并指出: 苏慧廉的译文更多是一种承续, 并没有超越理雅各的翻译。

比较经学研究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学术领域。有关学者植根于传统文献, 发挥比较思维, 实践跨学科性, 广泛借鉴了中西学界的各种成果, 为本次研讨班贡献了富于启发性的论文。在《缺席之“作”与替补之“述”——孔子“述而不作”说的解构维度》一文中, 上海师范大学郭西安博士以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如福柯 (Michel Foucault) 的作者理论、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关于起源与替补的讨论——为理论框架, 在较深刻的层次上重新估量了中国经学与古典诗学观念中的“作”“述”关系。她认为, 传统上“作”被赋予了起源与创生的权威地位, 对“作”的推崇和保护关联着经学话语的内在矛盾性, 既决定了“作”必然召唤“述”, 又标举着对增殖与多义的压抑, 与此吊诡过程相伴随的便是一方面对孔子“述而不作”不断重提与强调, 而另一方面却潜在策动着“明述实作”的话语实践。然而, 由于“作”从根本被维系于天道这一终极起源, 从来不曾完满在场, 现世所涌现之“述”对其的遵循和显明就成为一种实质上更为本源的替补运动。在经学话语场中, 正是“述”生产出了其所声称要补充之

“作”的可能性。郭西安总结指出，“孔子作《春秋》”与“孔子述而不作”两项经学声明聚焦出两种话语管控机制，即作者原则与注释原则，两者紧密互动，在控制话语的同时也催化了经学话语实践的流变与多样。

作为希伯来圣经中的重要篇章，“以撒捆绑”（Akedah）的故事几千年来为历代学者、注释家、思想家、作家所重视，聚集了关切的目光，也造成了深刻的困惑。在题为《杀不可杀——以撒捆绑与豫让故事中的被拣选性》的报告中，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张平教授列举了祁克果、列维纳斯、德里达对这一故事各自的解释，而属意于卡夫卡凸显人间气息、富于反讽色彩的演绎，并借此提出了问题：如何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理解以撒捆绑？张平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他对以撒捆绑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豫让刺赵襄子”的故事进行了比较，从二者“杀不可杀”到“不杀”的情节演变中，以“被拣选性”（chosenness）概念为核心，分析了希伯来传统中“圣经拣选”（biblical chosenness）与中国传统中“择为知己”（zhiji chosenness）的异同。张平分析道，亚伯拉罕和豫让面对“杀不可杀”的指令，无论是服从抑或抗拒，都会陷入悖论而丧失“被拣选性”；唯有遵从基于“或然性”的三种法则——实用主义法则（回报大于成本）、替补法则（以羊替换以撒、以赵襄子之衣替换本人）和同意法则（以撒甘心牺牲，赵襄子释放豫让）——主人公才能既避开可怕的故事结局，同时维系自身的被拣选性。

思想史及批判理论的研究，经常会涉足文学、历史、宗教及哲学的交叉地带。前者追问既往，以期为庞杂的精神成果勾勒出清晰的脉络；后者立足当下，力求直指人心、冲决网罗，探索思想的潜在可能。本次研讨班有三位发言人的选题属于这一领域。河南大学博士候选人侯春林在《神圣与世俗之间——“卡理斯玛”一词的演变》一文中追溯了卡理斯玛（“χάρισμα”）一词在保罗那里的本义和原初语境，又探讨了韦伯（Max Weber）对这一词语的重新发现与再创造——

“依靠个人超凡能力的权威类型”。20世纪下半叶至今，专业术语“卡理斯玛”（charisma）逐渐成为西方社会文化生活的常用词汇。侯春林认为，通过对“卡理斯玛”演变的梳理，可以发现耶稣和耶稣运动兼具神圣与世俗的双重性质。

中国海洋大学殷振文博士的论文《柔弱思想——理查德·罗蒂与反讽概念当代释义》是一篇概念释义之作，文章以古典时期的苏格拉底反讽为背景，重点分析了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对反讽概念的当代解读和重新运用，揭示了反讽的怀疑论、多元论和反形而上学等当代意涵。殷振文还将反讽修辞与贾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的柔弱思想联系起来，将反讽重新阐明和定义为交谈的谦逊、宽容和柔弱。

中国人民大学汪海博士的报告题为《亲密中的间距：布朗肖论我与他者关系的不可能性》。他指出，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在《总体与无限》中提出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一种非对称、非互利、且不构成任何总体的关系，哪怕在亲密的核心也仍然保持着无法取消的绝对分离（séparation）。在此基础上，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解构了列维纳斯可能保留的形而上学框架，提出了一种以“中性”思想为中心、既反人本主义、又反传统宗教观的无神论他者概念。